

## 怀念一个年代

高兴

二〇一八年秋，先后参加了《十月》和《钟山》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。两份兄弟杂志都创刊于一九七八年，一个至关重要的年头，无论于国家，于刊物，还是于个人。那一年，在停顿了十余年后，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，《世界文学》正式复刊。

纪念《十月》和《钟山》创刊四十周年，纪念《世界文学》复刊四十周年，实际上，就是在纪念一种珍贵和美好，就是在纪念一个伟大的时代，因为无论《十月》《钟山》，还是《世界文学》，恰恰都以文学的方式见证和呼应了一个伟大的时代。或者，换句话说，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产物和结晶。这个伟大的时代，我们郑重地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代。

我有幸与无以计数的其他同龄人一起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，逢上了改革开放，命运也因此完全改变。

时光流逝，许多事情都已忘却，却独独忘不了青春年代的点点滴滴。思绪常常转向并停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以至于间或会闪过一缕幻觉，仿佛重又置身于那个年代。回头想想，那个年代自然也有种种局限、毛病和缺憾，但就总体而言，我依然想说：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：单纯，开放，真实，健康，自由，充满激情和希冀，个性空间渐渐扩展，就连空气中都能听到积极向上的召唤，闪烁着英雄主义、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芒。那时，我们听邓丽君，办文学社和读书会，读《资本论》，读朦胧诗，谈

萨特和弗洛伊德，组织自行车郊游，用粮票换鸡蛋和花生米，看女排和内部电影，推举我们自己的人民代表。那时，学校常能请到作家、诗人、翻译家和艺术家来做演讲。有一次，北岛来了，同几位诗人一道来的。礼堂座无虚席。对于我们，那可是重大事件。我们都很想听北岛说说诗歌。其他诗人都说了不少话，有的甚至说了太多的话，可就是北岛没说，几乎一句也没说，只是在掌声中登上台，瘦瘦的、文质彬彬的样子，招了招手，躬了躬身，以示致意和感谢。掌声久久不息。北岛坚持着他的沉默，并以这种沉默，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我们当时有点失望，后来才慢慢理解了他。诗人只用诗歌说话。北岛有资本这么做。

那时，整个社会都在倡导读书，鼓励思考、创造和讨论，号召学习陈景润，号召勇攀科学高峰。我个人真正的阅读正是从那时，也就是从大学开始的。大学学习，紧张，而又充实。我们那批学生都异常用功，都有着明确和持久的动力和目标。在紧张学业的空隙，阅读，成为调剂和滋润，也有提高修养的意图。吸氧般地读。如痴如醉地读。杂乱无章地读。马不停蹄地读。那时，如果有某部作品，尤其是外国作品即将问世，消息会不胫而走，我们会连夜赶到王府井书店排队，就为了能购得自己渴盼的书籍。漓江出版社的《西方爱情诗选》就是以如此方式终于被我捧在手心中的。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小开本，轻盈的样子，不到三百页，定价为八角钱，发行量竟达到了近百万册。一翻开，便惊喜地读到马克思热烈似火的情诗《致燕妮》。于我，那可是本珍贵而亲爱的书，几乎伴我度过了青春时期最美好的时光。

复刊后的《世界文学》译介了一位又一位外国优秀作家，一部又一部外国优秀作品：茨威格的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

时》，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，谷崎润一郎的《春琴抄》，毛姆的《红毛》，托马斯·曼的《马里奥和魔术师》，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麦卡勒斯的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，劳伦斯的《狐》，卡尔维诺的《不存在的骑士》，福克纳的《我弥留之际》，马尔克斯的《迷宫中的将军》，帕斯的《太阳石》，久·莫尔多瓦的《会说话的猪》，格拉斯的《猫与鼠》，赫拉巴尔的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，曼德施塔姆、叶芝、布罗茨基、兰波、波德莱尔、休斯、勃莱、里尔克、博尔赫斯、博纳富瓦、霍朗、沃尔克特、希姆博尔斯卡、雅姆的诗歌，川端康成、塞弗尔特、米沃什、普里什文的散文，等等，等等。中国的阅读者和写作者源源不断地从《世界文学》获得来自异域的文学滋养。诗人、散文家汗漫说“作为读者，《世界文学》使我得到了读书生活的路标，也提升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天际线。只有去读那些值得一读的作家，才有可能写出值得一写的文字，度过值得一过的人生。我不懂外语，只能通过翻译家的劳动，认知那些外国作家的面孔与内心。杰出的翻译家就是作家，与异域先贤们进行着隐秘而伟大的合作，从而完成了那些异域思想景观的汉语表达。”

一个美好的时代会点燃人们的内在激情和生命活力，激活人们的想象力和表达力，拓宽人们的思想空间和创造空间；一个美好的时代一定是温暖的，人性的，敞开的，真诚的，向上和向善的；一个美好的时代会让人们充分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价值，并且由衷地说“生活美如斯，世界美如斯！”

2018年12月27日